

浅谈迦陵频伽造型的演变

张长虹

迦陵频伽，梵语作 kalaviṅka，巴利语作 karavika，又作歌罗频伽鸟、羯逻频迦鸟、迦陵毘伽鸟，略称迦陵频鸟、迦婆宾鸟、迦陵鸟、羯毘鸟、频伽鸟等；意译作好声鸟、美音鸟、妙声鸟。据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《新华严经》等佛经，此鸟产自印度，本出自雪山，在山谷旷野里较多。色黑似雀，羽毛甚美，喙呈赤色。它们在卵壳中即能鸣叫，音声清婉，和雅微妙，为天、人、紧那罗、一切鸟声所不能及。它在印度时是鸟的形状，吠陀文献里说是麻雀，佛教文献里是布谷鸟。传播到中国之后，其形状变成了人首鸟身。

关于迦陵频伽形象的来源，说法不一。台湾学者张水财认为，佛教书中其造型上半身为 人、下半身为鸟，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是东魏武定七年所作，其图像转化自印度紧那罗人头鸟之形，而非源于中土。陈雪静认为它是与古希腊有翼神兽的结合。孙武军认为它是多种文化因素碰撞的结果。

迦陵频伽的印度造型，佛经里面说是鸟的形状。李静杰发现，印度中央邦桑奇第一塔北门外，有四身人鸟嫁接式图像，共有四个上半身是人、下半身是鸟的形象，手执花环礼拜佛塔。不过从配置看，应是天人表现，难以说是迦陵频伽的造型，而且没有后继作品。

在中国传统中，人首鸟翼的形象比较多。比如汉代日神、月神的画像砖，就有人首鸟身的表现形式。有些早期的伏羲、女娲像，也是人首鸟身。

南北朝时期，人首鸟身的造型非常丰富。像北魏的石刻、东晋的砖刻，都有人首鸟身图像。南朝邓县画像砖的千秋、万岁图像，左为人首鸟身形象，旁边题名为“千秋”；右边的鸟名为“万岁”。所以，人首鸟身的造型，应是中国本有的。

印度的迦陵频伽鸟形象传到中国后，在本土化过程中，与这种人首鸟身图像融合了起来，上身变为女子形象。当然，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影响，比如中原文化以外的外来文化，尤其是祆教的祭司鸟神形象。

自从迦陵频伽的人首鸟身形象固定以后，在隋唐时期敦煌莫高窟等地的净土类经变画中，都有出现。尤其集中于观无量寿经变和药师经变画中。莫高窟迦陵频伽分布情况大概有隋：第 401 窟藻井；初唐：第



河南邓县画像砖，千秋万岁图，南朝



左：莫高窟 159 窟，西龛内沿装饰带迦陵频伽与缠枝花局部，中唐；中：张大千摹本，四川博物院藏；右：唐李宪墓石椁线图（局部），迦陵频伽与缠枝花，741 年



莫高窟第 45 窟，北壁观无量寿经变说法图局部，盛唐



迦陵频伽建筑构件，西夏，宁夏博物馆藏

220 窟、386 窟、217 窟；盛唐：第 45 窟、148 窟、172 窟；中唐：第 7 窟、44 窟、158 窟、159 窟、180 窟、237 窟、360 窟、379 窟；晚唐：第 12 窟、192 窟；五代：第 61 窟；宋：第 55 窟、118 窟、427 窟（门楣）。此外，西千佛洞第 15 窟（盛唐）、榆林窟第 25 窟（中唐），也有迦陵频伽的表现。榆林窟第 25 窟还有双头的人首鸟身造型，称为共命之鸟。《佛说阿弥陀经》里，同时提到了迦陵频伽和共命之鸟，后者出现时间稍晚。

从尾部形式看，莫高窟壁

画的迦陵频伽，初唐时尾部形状尚不完全确定，盛唐时才确立了蔓草纹卷尾形式，此后一直延续下去。比如莫高窟第 45 窟（盛唐）的迦陵频伽，第 158 窟（中唐）的迦陵频伽，第 61 窟（五代）的迦陵频伽，它们尾部的造型，都是蔓草纹卷尾形式。偶尔也有例外，比如第 44 窟南壁（中唐）观无量寿经变中的 4 只迦陵频伽，尾羽就比较短小。

唐代，迦陵频伽形象日趋成熟，并进入装饰领域。像莫高窟装饰带中的迦陵频伽，其尾部的蔓草纹和别的缠枝花交缠

到一起，已完全被作为花鸟嫁接式装饰纹样来使用，即上半身是鸟，下半身是花草纹。

在唐代明惠大师塔石刻和唐代大智禅师碑刻装饰上，迦陵频伽的尾部都是蔓草纹。这个卷尾形式，按李静杰的说法，是受印度花鸟嫁接式纹样的影响。除了与僧人墓葬有关外，迦陵频伽的造型样式，在唐代贵族墓葬装饰中也被广泛使用。盛唐李宪墓石椁装饰纹样（741 年），迦陵频伽的尾部，与后面缠枝蔓草纹的花，基本结合到了一起。唐玄宗宠妃武惠妃墓

石椁中的迦陵频伽形象，也已经作为装饰纹样使用，其宗教功能相对淡化。

可见，缠枝蔓草纹在唐代已被当作本土化、民族化的纹样来使用。这时迦陵频伽的鸟身形象，更多采用了凤鸟纹的尾部。在唐代的铜镜装饰上，凤鸟纹的尾部大都是蔓草纹形式，和迦陵频伽的尾部形象完全一样。宋代的铜镜上，凤鸟纹的尾部也是这种形式。辽代铜镜上的两只迦陵频伽的形象，尾部也是同样的蔓草纹，和凤鸟的区别只在于头部。

北宋时，迦陵频伽形象开始作为建筑彩画的纹样来使用。李诫《营造法式》中的图像显示，其尾部仍然保留着蔓草纹的卷尾形状。书中五彩遍装图样部分中有两个纹样，一为凤凰，一为鸾，它们上身造型相同，区别在于尾部的形状不同——凤凰的尾部是蔓草纹形式，鸾的尾部形状则分开像几根飘带。当然，这个区分比较粗疏。严格来说，这种“鸾”也可以被认定为凤。已发现有敦煌以外的迦陵频伽尾部形式，采用了鸾鸟尾部的纹样。不过它应该有另外一个演变的路线。

到了西夏王朝，作为建筑构件的迦陵频伽，风格跟敦煌等地区大不相同，采用双手合十的造型。作为具体的建筑构件使用时，由于功能的限制，它的蔓草纹卷尾已不复存在。

回顾迦陵频伽造型的演变路径，我们大致可得出如下结论：迦陵频伽造型的起源问题比较复杂，从鸟形到中国的人首鸟身，应该不止一个来源。这些问题，尚有待学界的补充与完善。当迦陵频伽形象出现于净土类经变画时，它代表妙音鸟、共命鸟。而当迦陵频伽形象出现在装饰带中，其装饰功能基本等同于凤鸟纹的形式。这种功能，广泛影响到长安及中原地区的丧葬类装饰。北宋时，迦陵频伽形象和凤鸟纹，作为建筑装饰已被普遍使用。而凤鸟纹尾部蔓草纹形式的变化与消失，时间应该在元代以后。

（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；本文据 6 月“融合”的视界——亚欧经典版画展”国际论坛上的发言修订，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7BZJ017《敦煌壁画榜题底稿的整理与研究》阶段性成果）